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中国历代军事家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中国历代军事家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军事家/中国军事史编写组著. —2 版.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ISBN 7-5065-1214-9

I. 中... II. 中... III. 军事家—简介—中国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7168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

2004 年 1 月第 2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6.75

字数:690 千字 印数:3 000 册

定价:56.00 元

本书执笔人

田昭林 陶文焕 陈西进
赵秀昆 石声璧 陈阳平
邓泽宗 姚志鸿 杨 琦

绘 像 魏楚予
审 校 董 珍
再版修订 田昭林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成员名单

郭汝瑰（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宴清	王腾达	书镇福	邓泽宗	方人熙	白太常
田昭林	史 说	冯祖海	刘冠雄	刘潜修	许耀钧
张 醒	张继寅	迟宝钺	陈西进	陈阳平	吴鹤云
何少桓	邵 青	杨 琦	杨家桢	杨素寰	杨伯时
庞 齐	尚宗钊	赵古松	赵秀昆	姚志鸿	倪定逸
陶文焕	曹月轩	梁明泉	傅仲侠	谭奇金	蔡炽甫

再版说明

本书原名为《中国军事史·第五卷·兵家》，根据读者需要，此次再版将书名改为《中国历代军事家》。

《中国军事史》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多卷集系统研究中国军事历史的专著，共7卷9册，约520万字，规模宏大，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理论研究价值，在军事学术和历史学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叶剑英元帅生前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认为：“它的出版，对发掘和继承我国古代军事遗产，开创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的新局面，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促进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部历史专著从编写准备始到最后出齐，历时27年；从第一卷出版起算，也达10年之久。其间40余位主要编写者多半陆续过世，其余现今大都病卧在床，足见其编写和出版的艰辛。对于这些为我国军事史研究和出版事业鞠躬尽瘁的功臣，祖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中国军事史》出版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电视台、广播电台及许多报刊作了广泛报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解放军报全文刊登张震的序言，并加编者按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曲折过程，我们自己的军事史终于问世了。”新

华社特发通稿，给予很高评价。这部书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远销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及欧美许多国家。许多学者从各自角度引证、吸收书中的史料和观点，促进了我国军事学研究的发展。该书曾获1988年度“中国图书奖荣誉奖”、“当代军人喜爱的军版图书奖”及“我所喜爱的解放军版图书奖”。1993年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它的获奖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军事史》出版十几年来，经受了多方面的检验，价值日益显露，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各界人士纷纷来信来电，热切希望能修订再版。为满足读者需求，我们将陆续修订部分最受读者欢迎的卷目，单独出版。本次继再版《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后又推出《中国历代军事家》，由田昭林先生负责修订，除修正错误外，还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充实了部分内容。期盼能继续引起读者的关注，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使之不断完善，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解放军出版社军事编辑部

说 明

“兵家”，指在我国军事史上有过重要贡献和成就，对军事科学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或影响的军事家。其中包括我国各民族的军事统帅、军事将领、农民战争领袖、军事理论家、军事谋略家、军事教育家、军事地理家、军事工程家以及军事科技家等军事人物。

本书是《中国军事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一般军事人物传记稍有不同。它不是以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为主，而是在概略介绍传主一生经历的基础上，着重叙述他在军事史上有一定影响的、特别是有关改革创新方面的事迹，并加以总结和评价。在评价时，力图将传主置于军事历史的发展长河之中，置于众多的军事人物之中，尽可能避免孤立地进行评论。通过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人物群像，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军事史上的重要事件及重要学术成就，使读者通读全书后，能大致了解我国军事发展的轮廓。

本书上起夏代，下迄清末，共选收兵家八十二人，分由九位同志撰写。全书由田昭林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统稿，最后由郭汝瑰定稿，董珍审校。由于分别出自九位执笔人之手，所以在选材、结构、评论方式和文字风格上不够一致；有些论点，也并非大家共同的认识。为尊重执笔

人的意见,有的未作改动。

本书人物头像是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和考古发现创作绘制的。

执笔人撰写时,都曾学习和参考过许多有关专家、学者们的大作,这里不再一一注明,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在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成都军区、解放军出版社、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博物馆等单位的首长和同志们,在工作上、生活上给以热情关怀、大力支持和各方帮助,我们衷心感谢。另外,解放军出版社陈济康、本组成员邵青两同志,在收集资料、审核史实和润色文字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这里一并表示谢意。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1989年12月

目 录

伊 尹.....	(1)
吕 尚.....	(9)
姬寤生.....	(25)
曹 刳.....	(35)
管 仲.....	(42)
先 轸.....	(55)
熊 侣.....	(65)
孙 武.....	(76)
伍 员.....	(90)
吴 起.....	(99)
墨 翟.....	(116)
商 鞅.....	(127)
尉 繚.....	(138)
孙 臆.....	(147)
赵 雍.....	(162)
田 单.....	(171)
白 起.....	(178)
李 牧.....	(187)
嬴 政.....	(195)
陈 胜.....	(213)
项 羽.....	(222)
韩 信.....	(234)
冒 顿.....	(246)
周亚夫.....	(253)

中国历代军事家

刘 彻	(261)
李 广	(276)
卫 青	(281)
霍去病	(287)
刘 秀	(292)
马 援	(307)
虞 诩	(316)
曹 操	(322)
诸葛亮	(336)
鲁 肃	(346)
司马懿	(352)
陆 逊	(359)
邓 艾	(367)
羊 祜	(371)
杜 预	(377)
王 浚	(383)
谢 玄	(390)
高 颀	(397)
李 密	(402)
李世民	(412)
李 靖	(423)
李 勣	(432)
张 巡	(440)
李光弼	(446)
郭子仪	(455)
李 晟	(465)
李 愬	(474)
赵匡胤	(479)
萧 绰	(496)

目 录

元 昊	(507)
岳 飞	(519)
吴 玠(附吴玠)	(531)
刘 琦	(541)
成吉思汗	(550)
余 玠	(566)
朱元璋	(578)
朱 棣	(604)
于 谦	(617)
郭 登	(630)
戚继光	(635)
孙承宗	(649)
顾祖禹	(656)
努尔哈赤	(665)
李自成	(677)
郑成功	(695)
施 琅	(710)
戴 梓	(721)
魏 源	(725)
丁拱辰	(736)
杨秀清	(748)
陈玉成	(756)
李秀成	(769)
曾国藩	(780)
赖文光	(792)
李鸿章	(802)
左宗棠	(817)
冯子材	(830)
丁汝昌	(837)



伊 尹

伊尹，本名摯，因曾在商汤时任官阿衡，太甲时任官保衡，所以因官得名，历史上又称之为阿衡或保衡^①。出土甲骨卜辞中，亦有称之为黄伊、寅伊或单称伊者。伊尹主要活动于夏末商初（公元前1600年前后），曾辅佐商汤取得灭夏战争的胜利，他既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也是我国军事史上有确凿记载的第一个军事谋略家。

一、身世和生平

先秦古籍多说伊尹为有莘（山东曹县西北）人，但对他的出身和进入商统治集团的经过，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墨子·尚贤中》说：“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庄子》、《楚辞》、《韩非子》及《吕氏春秋》等书，也有类似的记载，都认为伊尹是有莘氏的“小臣”，以庖人身份陪嫁有莘氏之女至商；他以割烹为比喻，向汤陈述了取天下的主

张,得到汤的赏识,从而被重用为最高辅政大臣。孟轲反对上述说法,他认为伊尹本是处士(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经汤三次聘请,方才出仕。《孟子·万章上》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求用于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三使往聘之,……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史记·殷本纪》则二说并存,未作明确的判断。目前通行的说法,一般认为《墨子》之说较为可信,并据之断言伊尹是有莘氏的奴隶。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看,伊尹不太可能是一般奴隶。众所周知,在生产力还相当落后的夏末,广大奴隶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最低层,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与条件,更没有从政治国的实践经验,怎么可能具有从奴隶主阶级立场出发的所谓尧舜之道或取天下之道的理论呢!虽然当时进入阶级社会还不过六七百年,社会的制度和观念还没有后来的商、周那样等级森严,但也很难设想以一个毫无政治地位的普通奴隶,竟能因一席游说之词,即一跃而成为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大奴隶主贵族。从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来看,“臣”和“小臣”,多指王朝中央的事务官。他们是国王身边的近臣,掌管国王的衣食住行以及占卜等事务,有时亦受命率军出征^②。因而,不论是“亲为庖人”的“媵臣”,还是“耕于有莘之野”的处士,不论是伊尹主动求用于汤^③,还是被动受聘于汤,都不是普通奴隶,而是有莘氏的亲近事务官,属于奴隶主阶级。他受过良好的贵族教育,早在归商之前,就已显露出统治才能,贤名远播邦外。所以《墨子·贵义》说汤在见到伊尹之前,就已认为“伊尹之于我国也,譬之良医善药”。又据《吕氏春秋·本味》记载,汤在得到伊尹之后,立即在宗庙举行隆重的接待仪式。第二天伊尹向汤讲述各种美味,汤问如何才能得到这些美味食品?伊尹说,你现在的国家太小,不可能具备这么多的东西。要想获得这些东西,首先必须取得统治天下的天子之位;要取得天子之位,又必须像懂得调和五味之术一样,懂得统治天下之道;^④而所谓统治天下之道,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其本在得贤”。伊尹的这些主张,

与汤“正(征)域(有)彼天下”^⑤、以取夏桀而代之的意图正好相合，因而认为伊尹的到来，是天降贤士辅佐自己^⑥，于是破格重用，任以为相。伊尹遂成为商统治集团中智囊人物，为灭夏战争的准备与实施，出谋划策，制订战略，充当了类似后世的军师和近代的参谋长的角色。

商族是华夏族中的一个部族，生活在黄河下游的河南、山东一带。至汤为王时，早已进入奴隶社会，经济也较为发展，实力已逐渐强大。当时夏王桀(帝乙)暴虐荒淫，统治出现危机，小贵族及民众、包括奴隶都对之不满。汤曾被桀囚于夏台，当然更为不满。释放回国后，即任用伊尹为相，决心灭夏。伊尹辅佐汤王，加强政治，注意“修德”，争取民众及各邦国诸侯的同情与支持；然后采用军事手段，由近及远地逐个剪除夏桀羽翼，以削弱、孤立敌人。首先征服了邻近商都的夏属国葛(河南宁陵北)，以保障商都南亳(河南商丘东南)的安全。接着又灭掉了韦(河南滑县东南)、顾(山东鄆城东北)和昆吾(河南许昌东)三个夏属国；并争取了薛(山东滕州南)和有莘氏等诸侯的支持。据说共作战十一次，都取得了胜利。^⑦在此期间，伊尹还曾两次至夏进行战略侦察，了解夏王朝的政情、军情和民情。^⑧当伊尹认为时机成熟时，即将商都迁至北亳(河南商丘北)，集中兵力向夏发动进攻。汤和伊尹率战车七十乘，敢死之士六千人，联合其他诸侯，绕道西方向夏都斟寻(河南巩义西南)进攻。在鸣条(河南封丘东)决战中，大败夏军。桀逃至三腰(山东定陶东北)，商军跟踪追击，桀再逃至南巢(安徽巢湖北)，夏遂灭亡。汤在西亳(河南偃师二里头)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天下的统治权，终于转移到商汤手中，登上了天子的宝座。

商王朝建立后，伊尹被任命为王朝最高的公官阿衡，掌握了王朝的军政大权。汤去世后，伊尹立汤子外丙继位；两年后外丙死，再立外丙之弟仲任；四年后仲任又死，伊尹乃立汤的长孙太甲继位。太甲继位三年，即改变汤和伊尹制订的政策法令，推行暴政。当时商王朝虽然已历三王，但从汤死时计算，不过才六七年，统治

尚未巩固。伊尹遂将太甲囚禁于桐(河南虞城东北),自“摄行政当国”,代理天子之位。据说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又把太甲迎回,交还了政权。太甲“更尊伊尹曰保衡”^⑧,仍然执掌着王朝的实际权力。直到太甲之子沃丁即位后,伊尹才老病死去。综观伊尹一生,他在消灭夏桀、建立和巩固商王朝的事业中,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为我国军事理论的发展,迈出了开拓性的第一步。

二、军事方面的成就及贡献

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与了灭夏战争的计划、准备与实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文献对这次战争的记载,多语焉不详,缺乏系统、具体的述。虽然如此,综合文献各说,加以归纳,仍能看出伊尹在这次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军事发展的角度来看,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及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第一次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运用于战争指导

夏、商都是在我国黄河流域建国的王朝,这里的地理条件适宜于农业生产,所以夏、商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不能不受农业生产水平的制约。由于当时生产力不高,还处于靠天吃饭的生产水平上,人们对大的自然灾害还无力克服,所以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在当时占统治地位。认为上帝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活动,都受上帝意志的支配。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神权政治,最高统治者们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后裔,是天之子,他们的权力和行为,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如商汤在灭夏战争的动员令中说:“格尔庶众,悉听朕言,非台(我)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征)。”^⑨表示他是奉天命讨伐夏桀。因而,人们对战争的胜败,也认为主要依靠天命,每次战争之前,必先向上帝及祖先祈祷,恳请降福、赐予力量,并用占卜向神请示,以决定行动和

指导作战。但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通过对前人无数次战争实践的总结,伊尹已开始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朦胧地发现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感觉到了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胜败。他和汤都认为“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⑩,把民众拥护国君与否,看做是衡量一国治乱兴亡的重要尺度,而不再认为是单纯的天命。这一观点就成为伊尹指导战争的主要思想。

伊尹第一次去夏时,看到桀“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就判断“夏命其卒”,认为夏王朝的覆灭已不可避免,因而与汤共同定下“必灭夏”的决心^⑪。在战争准备期间,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现实,伊尹强调“修德”,对内争取广大民众的拥护,对外争取其他邦国的支持,促使人心背夏而向商。战争开始时,又在动员令中痛斥夏桀的暴政,说他强迫劳役,用尽民力,残酷剥削、遭民痛恨,为此才不得不讨伐他^⑫。其用意依然是争取民众的拥护和鼓舞战士的斗志。

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在现在来说,当然是人所共知的简单公理,但在三千六百多年以前,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造。伊尹能够看到这一点并运用于指导战争,不能不说是军事发展的重要贡献。

二、第一次采用“用间”谋略

早在原始社会,人们从狩猎活动中,就已学会了根据野兽情况决定行动的原则。因而,在进行战争时,必然也懂得侦察敌情。但在认为国家治乱兴亡全出于天命的神权政治时代,这种侦察却只能是纯军事性质的战场侦察。由于伊尹已经感觉到了民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所以他在两次去夏时,就主要是侦察夏王朝的政情和民情,属于战略侦察。根据第一次侦察结果,判断夏桀必败,从而定下灭夏决心之后,第二次去夏,就不仅仅是了解情况,而是进一步用扩大敌人矛盾的办法破坏其内部团结,以削弱其实力,为未来灭夏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据《竹书纪年》说: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瑛。后爱二人,……而弃其元妃于洛,